

# 一二八淞沪抗战述论

马仲廉

一二八淞沪之战，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在炮制伪满洲国期间所进行的又一次侵略中国的军事行动。在中国的历史上，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又称淞沪战役。本文试图对这次战役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作一概括论述，以请教于学者。

1932年1月28日，驻上海日军海军陆战队，向驻防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所部发动攻击，中、日两军第一次淞沪战役发生。

日军于此时向淞沪地区发动进攻，是出于何种原因，其目的何在？

在日军发动进攻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中国的“排日运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在上海，抗日总会和其他各种排日团体最为猖狂，尤其最近发生了《民国日报》登载对日本皇室不敬的消息和杀伤日莲宗和尚的事件等等。自此以来，事态日益恶化。由此，帝国驻上海总领事对中国地方当局提出有关取缔排日运动及其他的要求。虽然这些要求都是公正适当的，但中国方面一面迟迟推延答复，一面在上海周围集中军队，采取威吓我方的态度。为此，我国侨民有了极度的危险感”。“此次我国海军在上海方面的行动和已往各国在该地屡次采取的实力行动相同，完全以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及其他我方权益为目的，别无他意”。①从这一声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将其

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第一版，第47、48页。

对上海的进攻，说成是由中国（特别是上海）的“排日运动”所引起，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及其他权益。这完全是借口与诡辩。事实上，它对上海的进攻，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为掩护泡制伪满洲国而采取的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

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并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反抗及对国民党统治当局所采取的对日不抵抗政策的不满。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下，全国各地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广大学生、工人、商人、市民和爱国人士，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请愿团、示威团。他们发表宣言，示威，请愿，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组织义勇军，惩办汉奸，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在这场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运动中，上海市确实表现得尤其强烈。这些抗日救亡活动，是一个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完全正义的合理的行动。上海人民在救亡运动中表现得更为激烈，也是由于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日本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是毫无道理的。

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三省，也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其中主要是拥有在华权益的美、英、法、苏等几个大国。美国政府对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东北表示“惊讶”，“遗憾和忧虑”，并在日军飞机轰炸锦州时对日本提出警告，照会中、日两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sup>①</sup>英、法两国是国际联盟的主要成员国，国联的活动基本上由该两国操纵。事变后的9月22日，国联特别理事会发表声明并作出决议，授权西班牙代表理事会主席勒乐对中、日两国政府发出通知，阻止事态扩大，两国立即撤

<sup>①</sup> 彭明等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4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页。

兵。30日，国联理事会开会作出九项决议，中心内容是要求日本尽速撤兵，中、日两国政府采取各种的必要的方法，避免事件扩大，恢复正常关系。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又作出了要求日本迅速撤兵的协议。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决议指派5人委员团就地考察。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九一八事变后，在道义上始终同情和支持中国，同时对日本侵犯苏在中东路的权益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者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最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当然，美、英、法等国政府，基本上是采取了对日妥协和对事态发展持观望的态度，并无制止日军侵略的实际行动。而苏联政府除道义上同情中国，为了缓和苏日关系，防止引起苏日冲突，采取了不干涉的中立态度。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感到了国际上对它的严重压力。

在上述情况下，日本决定在上海这一敏感的城市制造事端，发动军事进攻，想以军事压力逼迫中国政府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转移国际视听。

美国人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中，详细地披露了日本为转移国际视听，在上海发动战争的事实。书中记载，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武官辅助官田中隆吉应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的电召，于1931年10月1日前往沈阳。板垣告诉田中：“日本政府屈服于国联的威胁。因此，我们的计划受到了干扰。我们下一步行动要占领哈尔滨〔北满首府〕使满洲独立。我们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仪〔儿皇帝〕来。如果我们办成了，国联要大吵一番，东京政府将感到头痛。我要请你在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当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满洲。”<sup>①</sup> 1932年1月10日，板垣在东京给上海的田中发了一个电报说：“‘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

<sup>①</sup>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著：《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585页。

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sup>①</sup>田中接到板垣的电报后，便开始了利用女特务间谍川岛芳子制造事端，挑起战争的勾当。关于这一点，田中本人在战后完全承认。

笔者认为，日本为占领东北，制造伪满洲国，转移国际视听，是发动上海战争的原因之一。不过，我们绝不能将日军进攻上海看成是板垣与田中个人之间搞的阴谋，也不能看作是日本关东军与上海日本领事馆之间的勾当，更不能认为川岛芳子的活动在挑起事端中起了多大作用。事实上，日本人在上海的挑衅活动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便不断发生。诸如，日本人殴打中国工人、市民，撕毁商店广告，击毁商店橱窗等时有发生，不过到一二八事变前发展到更激烈频繁的程度而已。应该说，日军进攻上海是日本统治当局的决策，这一点，只要看看当时的历史事实就明白了。

板垣由东京给在上海的田中发出那封电报之前，他已经同参谋本部策划了在上海发动战争的准备。在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板垣入宫向天皇裕仁禀奏了建立伪满洲国的进展情况。此后，日本海军便不断地向上海增加舰只和海军陆战队。1月21日，又派出了巡洋舰大井号和第十五驱逐队四艘驱逐舰。这些舰只于23日到达上海。24日，航空母舰能登吕号也驶抵上海。26日，天皇裕仁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的主持下，已经训令在上海的海军盐泽司令官“行驶自卫权利”了。

这些就是日本发动上海战争的背景。

## 二

驻防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所部，是新近由江西调来的部队，归京沪卫戍司令长官指挥。1931年9月30日，南京政府发表陈铭枢为京沪卫戍总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于是陈调驻防江西赣州地区的

① 戴维·贝尔加米尼，前引书，第608页。

第十九路军驻扎京沪为卫戍部队。

第十九路军在江西期间，受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又受到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口号在十九路军广大官兵中深入人心。全军在赣州曾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10月24日，蔡廷锴在赣州召集第六十师及第六十一师官兵训话，勉励将士要“与国俱存，与国俱亡，死要死在国亡之前”。11月1日，第六十一师离赣移防京沪时发表《告赣民众书》，表示了对日本侵略的愤慨和抗日的决心，略谓：“际此国难声中，自当敌忾同仇，以御外侮，本师誓效前驱，踏平三岛，饮马东京，以雪国耻。”<sup>①</sup>十九路军陆续调防京沪以后，又受到了全国人民及京沪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直接影响。广大官兵更下定了为中华民族求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特别是驻防上海地区的第七十八师所部，看到了日本人在上海的不断挑衅行为，更为义愤。第十九路军调防京沪的时间虽然不长，对全局情况并不了解，但从日人在上海的不断挑衅和日本海军不断增兵上海的活动中，判断日军对上海的进攻不可避免。为此，蔡廷锴曾于1932年1月上中旬两次到南京请示陈铭枢。陈表示了在不得已时抵抗日军进攻的决心。

这时发生了日本僧侣被殴，日人烧毁三友实业社并捣毁商店橱窗等一系列事件。

1932年1月18日，日本僧侣5人经过引翔港地方，行至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附近时，遭到中国一些工人的殴打。20日晨，日本“上海青年同志会”32名会员携带武器、木棍、酒精和煤油等物品，放火焚烧三友实业社。当日下午，1000余日人开会，决议电请日本政府派陆海军压制中国人民排日运动，会后游行示威，大呼口号，沿街挑衅，将市内十余家商店橱窗打碎。<sup>②</sup>21日，上海各大报均显著登载了日人放火烧毁三友实业社的新闻。《民国日

<sup>①</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7辑，中华书局1989年，第191、197页。

报》的标题中有“日浪人藉陆战队掩护”字样。22日下午，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借口与事实不符，向该报提出无理要求：主笔到陆战队提出公文陈谢，揭载半张大地位之谢罪文，保证嗣后不再发生此种事件，罢免直接责任记者职位，并限23日上午5时前答复。该报对于日军的无理要求未予理睬，而只对新闻报导予以“更正”。但是在当日下午，日侨1000余人又集会，攻击《民国日报》。《民国日报》被迫接受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劝告而停刊。

日人的挑衅和日海军的增援，使上海呈现了一片紧张气氛。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12月下旬代替陈铭枢任此职）于23日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上海部队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决定死守上海。会后于当日下午7时发出密令，命令各部，“严加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sup>①</sup>命令决定第七十八师之一五六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该师之一五五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含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南市、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位于丹阳之第六十师第一一九旅第三团，限于24日到南翔附近待命，第六十、六十一师为总预备队。会后，将总指挥部移至真茹。24日，蔡廷锴又到苏州召集第六十师高级将领举行紧急会议，传达了23日所发密令，并进一步作了战备动员。

嗣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表了《告淞沪民众书》，其内容除叙述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行为和近日上海日人挑衅并派大批军舰来沪作发动战争的准备情况外，表示决心：“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本总指挥、军长、司令愿与我亲爱之淞沪同胞，携手努力，维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后有秩序之决斗，决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淞沪万国具瞻之范围扰及我安居，

<sup>①</sup>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未刊稿，无页码，下同）。

损及我一草一木。”<sup>①</sup>

对于日人挑衅及日本方面所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上海市政府遵照南京政府的指示，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1月20日下午3时，上海市长吴铁城派市政府秘书俞鸿钧，就日人烧毁三友实业社事，前往日本领事馆提出口头抗议。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表示遗憾，并允严纠凶犯。21日上午10时，村井到市政府对吴铁城市长当面又表示了前述态度，但同时对日本僧人被殴伤事提出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要求：一、市长对总领事道歉；二、逮捕肇事者；三、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四、取缔排日活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如不给予满意答复，则海军司令官采取相当手段，以保护日本帝国之权利利益。25日下午，日本领事村井到上海市府催促答复所提要求。26日，村井再次到市府提出限48小时内答复的最后通牒。上海市府被迫于27日下令取消各界抗日救国会。但在当日，村井又口头通知吴铁城，要求下令将凡有抗日字样的团体一律解散，限于28日下午6时以前得到满意的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手段，以实现其要求。28日下午4时45分，吴铁城答复日本总领事，表示完全接受四项要求。但在吴答复接受四项要求的两小时后，公共租界工部局即下达了戒严令，通告各国驻上海军队司令官对各自警备区域加强防备。下午8时30分，日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发表声明：“目前上海不论租界内外，人心动摇，不稳的局势日益恶化。工部局公布了戒严令。各国军队正在严加警戒。帝国海军因担心有多数日侨居住的闸北一带的治安，特决定配备兵力负责维持。本司令官切望中国方面尽快撤除配备在闸北方面的中国军队的敌对设施。”<sup>②</sup>声明发表后，日军即开始了所谓的自由行动——对上海中国驻军十

①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

② 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译稿，第135页。

九路军所部的进攻。

### 三

1932年1月28日23时30分，驻上海日军向闸北布防的中国第十九路军所部发动进攻，守军奋起抵抗。淞沪战役从此展开。

所谓淞沪，是指长江口南岸的吴淞与上海市区及其相联结的一片平原水网地带。它东临大海，北靠长江。在市区内有吴淞江（苏州河）穿过注入黄浦江，将市区切为南北两部分；西边即是太仓、昆山、青浦及苏州、吴江、常熟等水网地带。市内黄浦江西岸，吴淞江南北有外国租界。各帝国主义国家在租界内有常驻的军队。其海军舰只不受任何限制地在黄浦江及长江内游弋。日军进攻淞沪地区时，租界地可作为其根据地和进攻出发地，游弋于黄浦江和长江的舰只可对陆军部队以炮火直接支援。由日本国内增援的部队可在吴淞以西的长江各口岸登陆，对在市内防御作战的中国部队实施战略迂回，威胁防守部队的翼侧和后方。其飞机可由停泊在黄浦江和长江上的航空母舰起飞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守军必须有足够的陆军兵力在市区与吴淞及其以西长江沿岸布防，在空军与海军的协同下，一方面在市街作战，一方面实施抗登陆作战，而这些是第十九路军所不能担负的。

当时在淞沪地区中，中日两军的实力如下。

**日军：**海军第一遣外舰队，拥有战舰17艘；第二十四驱逐队，舰4艘；第十五驱逐队，舰4艘；第一水雷战队，舰12艘；航空母舰能登吕号，飞机6架。海军上海陆战队3个大队，1500余人，连同其它各舰陆战队，共约3000余人。

**中国军队：**第十九路军，辖第六十、六十一、七十八师，共计3.3万余人。在淞沪地区布防的仅第七十八师两个旅和吴淞要塞守备部队及北站宪兵营。

战役展开以后，日本海军上海陆战队，在皎岛大佐指挥下，

分为中央、北部、虹口、西部、东部5个警备队，向十九路军闸北防线展开攻击。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一五六旅所部奋起抵抗。战至29日拂晓前，守军打退了日军多次冲击，阵地屹立不动。天亮后，日军在飞机支援下攻占北站守军阵地。当日下午，守军又将北站夺回，并将日军驱逐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日军的第一次攻击失败。

日军初次攻击失败后，于29日晚通过英、美等国驻沪领事，向十九路军提出停战要求，提出只要中国方面不攻击，日军即不采取攻势。可是，30日日军继续攻击，又经英、美领事调停，并经双方谈判，约定停战3日。

在停战期间，日本海军省派驱逐舰4艘、巡洋舰3艘、航空母舰2艘、载海军陆战队数千，陆续抵上海。十九路军也在此时调整部署，将驻镇江以东地区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真茹一带，并将第六十一师也调运来沪。原在上海的第七十八师全部进入前线，加强防御。

2月3日早晨，日军再次向闸北发动进攻，守军坚守阵地，顽强战斗，连续激战3昼夜，至2月5日下午4时，日军遭受严重伤亡后，停止了攻击，退回原阵地。但高桥炮台被日军炮火完全破坏。

由于日军向闸北进攻的失败，日军决定将新增援的和原在上海的海军组成第三舰队，调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为司令官，代替原指挥官盐泽，并调植松炼磨少将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同时，日本陆军中央部派陆军第九师团和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增援上海作战。

日军上海陆战队，为掩护陆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登陆，于2月7日上午分两路向吴淞进攻。停泊在浦东、川沙、白龙港一带日军舰只10余艘和浦江中杨树浦停泊的驱逐舰数艘，也先后驶向吴淞参加战斗。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于当日下午6时前在吴淞铁路码头登陆，集结在徐家宅附近。

8日拂晓，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分3路，在飞机、舰炮支援下，向张华浜、蕴藻浜、吴淞镇等处进攻，在中国守军顽强抵抗

下未逞。至下午8时许，进攻日军分别退至引翔港、杨树浦、狄思威路转为防御。

12日上午，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为在蕴藻浜北岸夺取进攻吴淞的支撑点，以一个大队占领沈家宅，并以工兵中队在永安纱厂附近架桥，当即被守军击退。当日夜间，日军利用夜暗架桥成功。13日拂晓，日军在烟幕弹掩护下强渡蕴藻浜，在曹家桥附近突破守军防线。十九路军调第六十师一二二旅增援，将渡河日军包围。被围日军在救援部队接应下拼力突围，但只有少数日兵突出，大部被十九路军消灭。

18日前，增援日军第九师团陆续到达上海。18日下午，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向十九路军与上海市长发出最后通牒，被十九路军所拒绝。此时，张治中指挥的第五军到达淞沪参战。蒋光鼐任命张为左翼军指挥官，接替江湾北端经庙行镇，沿蕴藻浜至吴淞西端之线的十九路军防务；以蔡廷锴为右翼军指挥官，指挥十九路军担负由南市、龙华、北新泾、真茹亘闸北、江湾之线地段的防御。

20日，日军第九师团和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对淞沪地区中国守军发动总攻，除以一部兵力监视吴淞炮台外，主力攻击庙行、江湾一线第五军和第十九路军阵地，企图将守军消灭在吴淞江以北地区。双方激战至26日，日军的总攻失败。

日本陆军中央部鉴于第九师团在上海的失败，下令组成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以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增调第十一、十四两个师团到上海参战。2月29日，第十一师团的一部乘舰到达长江口。白川于当日下达了总攻淞沪的作战命令：以第九师团夺取张家桥、夏马湾一线，第十一师团在七丫口附近登陆，然后袭击浏河镇，并准备向大场、真茹进攻；海军第三舰队及海军飞机配合陆军作战。

3月1日晨开始，日军对淞沪地区中国守军发起全线攻击。守军仍沉着应战，但因抽调部分兵力驰援浏河方面作战，正面防守兵力薄弱，战线不断被日军突破。由七丫口登陆的日军第十一师团

击退此处少数守军后，向浏河镇攻击，并攻占浏河。中国守军第五军急派二一六旅前往截击。

由于大批日军在七丫口登陆，并占领浏河后继续前进。中国守军侧后方受到严重威胁，又得不到重兵增援，不得已，蒋光鼐于3月1日下午命令部队向黄渡、方泰镇、嘉定、太仓之线撤退。

日军于3月2日上午实施追击，至3月3日，占领了浏河镇、嘉定、南翔、真茹，并在该线集结，停止了追击行动，同时发表了停战声明。3月6日，中国第十九路军也发表了停战布告。至此，淞沪战役宣告结束。

在整个战役期间，上海人民积极支援和参加作战。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也积极声援和支援十九路军作战，给前线作战的广大官兵以巨大鼓舞。

此次战役，中国军队伤亡官兵1.3万余人，日军伤亡，据日方公布的数字为3000余人。此外，中国人民群众伤亡和失踪共计2.1万余人。

#### 四

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在上海人民直接参加与支援下，对日军坚持了一个多月的作战，迫使日军三易主帅，不断增兵，取得了辉煌战绩，获得了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称赞。然而，战争的结局，则是以该军的后退而告终。而且，南京政府还与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这是蒋介石和中国政府当局采取的误国政策的结果。

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下，命令东北军不抵抗，使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当日军不断增兵上海和日人频繁挑衅，十九路军备战的紧张形势下，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当局最担心的是上海发生战争。1月23日下午，时任行政院长的孙科与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日方案，事后给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特急电说：“金主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

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sup>①</sup> 战役爆发的前4天，蒋介石指使前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劝说十九路军退出上海，避免与日军冲突，被蔡廷锴严词拒绝。1月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向十九路军连发3次急电，“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sup>②</sup> 接着又命令宪兵第六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接替闸北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的防务。接防未成，日军即于当夜发动了进攻。

战争爆发以后，29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迁都洛阳，并设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等为常委。当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说：“为执行中国主权上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并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sup>③</sup> 30日，中国政府发表迁都洛阳宣言称：“政府为完全自由行驶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决定迁都洛阳办公。”<sup>④</sup> 当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将士，“抱玉碎之决心，与暴日相周旋”，并称：“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sup>⑤</sup> 蒋介石和政府当局决定的原则是，“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所谓一面预备交涉，是依靠国联；所谓积极抵抗，当时确定以第十九路军守上海，以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守南京。这样的决定与措施，与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政策有所不同，可是，南京政府当局是设法依靠国际干涉，尽快停止上海战争。所以，“积极抵抗”则变成了积极求和。1月31日，何应钦电蒋光鼐、蔡廷锴和吴铁城，要求接受各国领事调停，并命令第十九路军“严守纪律与秩序，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

①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第531页。

②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45页。

③ 《中华民国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8辑，中华书局，1989年，第22页。

④⑤ 同上书，第24页。

前线部队尤需遵守”。<sup>①</sup> 2月1日，英、美、法、德、意等国向中、日两国提出5项劝告：一、中日双方立时停止一切暴烈行为及暴烈准备；二、中日双方不能动员及动员准备；三、上海中日双方军队接触之地立即撤开；四、撤开之地由友军驻扎；五、停止冲突后，由列强居间从事交涉，以解决中日间一切争端。根据非战公约及国联行政院12月9日决议，双方不得有预先要求或其它保留之条件，并由列强列席或参加交涉。对于英、美等国的劝告，中国政府立即表示完全同意。日本则一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再次向闸北发动了新的进攻。

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孤军奋战，中国政府不但不调兵增援，反而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密令各舰队不攻击日舰，应守镇静。2月3日，日海军舰炮轰击吴淞各地。国民党海军驻上海舰队奉令不准还击。2月5日，何应钦以特急电令蒋光鼐、蔡廷锴，原配属十九路军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sup>②</sup> 8日，何应钦又以“火急”电致上海市长吴铁城和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们，提出“适可而止”，从速设法停止战争。电报中说：“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可而止，盖期早得收束，为国家多留一分元气也。昨英海军司令在沪会商调解，闻诸同志中多主张须依据各国通牒第五条，连同东省问题整个解决，以致毫无结果，失此斡旋良机，深为可惜……。请兄等商在沪外委，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至于整个问题，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庶不致益加扩大糜烂而不可收拾也。”<sup>③</sup> 12日，何应钦又严令十九路军，“南市守军不得有挑战行为，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攻击时，不许发弹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sup>④</sup> 接着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派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和军政部政务次长陈仪到上海向日军乞和。13日夜，何电十九路军：“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到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

<sup>①②③④</sup>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

武官原田及第九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sup>①</sup>紧接着在当夜又以“限30分钟到”的急电，致蒋光鼐、蔡廷锴、吴铁城、宋子文：“介公刻到浦镇，召弟等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其办法如下：一、如日本确无侵占闸北之企图，双方立即进行停战办法；二、停战条件须双方各自撤退至相当地点，中国军队退出地方由中国警察维持。请兄等仍斟酌外部前开接受英、美调停办法各电及陈公侠兄所言王俊所述办法，择其于我有利者，从速进行。”<sup>②</sup>陈仪、王俊到上海向日军求和，举行谈判，但日军坚持中国军队必须先撤退的条件，而和议破裂。

南京政府对十九路军在作战中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药器材，一概不予补给。所需平射炮和高射炮以对付日军的坦克和飞机，十九路军一再请领，军政部始终未发一炮一弹。在淞沪战役期间，政府还停发十九路军的军饷。海内外同胞捐赠给十九路军的款项约700万元，被军政部作为军饷分发。

在国民党当局不予派兵增援，日军不断增兵和在侧后登陆迂回，无兵救援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只有被迫撤退。正如十九路军于3月2日向全国各界发出的退守待援电文中所说：“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2月1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sup>③</sup>

国民党当局所以对淞沪抗战采取消极、甚至制止的态度，其

①③ 《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8页，第9—10页。

②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29册。

根本原因就是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当时任第八十七师二十六旅旅长的宋希濂代表全旅官兵于1月30日面见何应钦，请求开往上海参战。何应钦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按即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的政策），弄得中央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sup>①</sup>破坏中央的什么政策？挑明了，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月23日，上海局势紧张，蒋介石、汪精卫和孙科在南京开紧急会议。蒋、汪主张“先行安内，方可攘外”，并批评陈友仁等对日绝交的主张。<sup>②</sup>2月14日，何应钦致电吴铁城称：“回顾国力，除财政问题外，抗日剿赤两难兼顾”，“两者只能出于一途，万难并进也。”<sup>③</sup>当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委们质问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什么不调兵支援十九路军时，黄说，上峰的决定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果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sup>④</sup>何应钦和黄慕松在这里表露得十分清楚明白。这都说明了国民党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是淞沪战役失败的根本原因。

## 五

第十九路军撤退到第二道防线，日军占领了浏河、嘉定、南翔、真茹后，停止了追击行动，发表了停战声明。日军为什么不乘胜扩大战果，继续向十九路军攻击，而结束作战行动呢？按照日军于3月3日发表的停战声明说：“现在中国军已退至帝国陆军当初要求的距离以外，帝国臣民的安全保障和上海租界的和平，从此可望恢复。因此，本司令决定只要中国军队不采取敌对行

<sup>①④</sup> 《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9—10页。第28页；第47页。

<sup>②③</sup>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8辑，中华书局，1989年，第17页；第41页。

动，我军将暂时原地不动，停止战斗行动。”<sup>①</sup>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说，是他“费了半天时间，才说服白川大将，发出了停战令”。他所以劝说白川发停战令的原因是，他认为“既然日本军驱逐了中国军，便可恢复上海治安，决心必须立即停战，遂前往司令部向白川大将商洽”。<sup>②</sup>而事实上，日军所以在此时发出停战令，是因为其炮制的伪满洲国已经筹备就绪，并决定在3月9日正式宣布成立。同时，国际联盟关于日本侵华的会议，定于3月3日11时（上海时间3月4日4时）于日内瓦召开。日本认为在国联开会前停止作战，并发表停战声明为上策。至于停战以后，如何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果，则是同中国政府当局进一步谈判的事了。

中、日双方的和谈，在战役展开以后，就在英、美、法、德、意等国驻华使节的斡旋下开始了，但在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日军的作战目的尚未达到的情况下，是不能达成协议的。中、日双方代表正式接触是从2月28日开始的。在列强驻华使节斡旋和国联干预下，双方经过多次谈判，于5月5日正式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

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它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权益更加扩大。例如第一条，“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表面上看，这条好像对中日双方不偏不倚，可须知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行的停战，停战发生疑问时，中国方面竟然无权调查，无权参与处理。其第二条更为明显地有损于国家主权，实际上规定了由苏州、昆山至上海的地区内中国无权驻兵。所谓“所涉及区域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是什么样的“常态”什么样的“办法”，都是很难明确其含义的；什么时候才能决定出恢复常态的办法，也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另外，除协定正文外，还有中国政府取缔

<sup>①</sup> 《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译稿，第175页。

<sup>②</sup> 重光葵著：《日本侵华内幕》（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7页。

抗日，十九路军换防和浦东、苏州河南中国不得驻兵等三条所谓谅解。这样，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变成一个不设防的城市，而日本反而能在市内驻兵，能以此为基地向中国内地进兵。这真可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又一奇耻大辱！

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淞沪战役的正式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上海的侵略战争，企图达到镇压中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目的是永远也达不到的。淞沪战役，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野心，也更加认清了蒋介石国民党妥协退让的政策，因而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抗日民主运动一浪一浪汹涌澎湃地展开。如果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上海进攻的另一目的是企图转移国际视听，在东北组织为其服务的傀儡政府，则应该说是达到了。就在3月初，十九路军后撤，中日双方根据国联决议进行停战谈判的紧张时刻，伪“满洲国”于3月9日宣布成立。

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目睹了淞沪战役的全过程。后来，他在所著《复始之旅》一书中说：“然而，上海一二八之战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永久的不可逆转的影响。它使中国许许多多青年人相信，如果全国团结一致进行爱国斗争，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有正直、无私的人来领导，经过良好的训练和有充足的装备，中国军队也同样能够很好地为自由而战。这一‘发现’振奋了人们正在消失的斗志，最终造成了一种政治气候，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与他的‘最凶恶的头号敌人’妥协，共同抗日。主要是这一事实，而不是这场战斗的表面结果，将使亚洲的历史发生决定性的改变。”<sup>①</sup>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sup>①</sup> 埃德加·斯诺著：《斯诺文集》第1卷《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第一版，第120—121页。